

共匪農村教育革命的經緯

汪學文

一 農村教育革命的演變

民國四十年十月，共匪公佈「關於改革學制的決定」，強調教育要爲工農開門，並注重技術教育。而在學校系統方面，將小學六年四二制改爲五年一貫制。並增設工農速成初等學校（二至三年）、和工農速成中學（三至四年），這是大陸學制的初步改革，也是農村教育的第一次「革命」，但是，到民國四十四年小學又恢復六年制，而工農速成學校也全部停止招生。於是這一次的教育革命就此宣告無疾而終。

四十七年九月，匪黨中央與僞國務院聯合發佈「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規定「一切學校須將生產勞動列爲正式課程」以後，大陸各地就試辦了一批半農半讀的學校，如「農業中學」、「勞動大學」等，但是據說後來因爲缺少經驗，並且遇到連年的自然災害，經濟上發生困難，加上「有些具有資產階級教育思想的人竭力反對這種新的教育制度」、「有些辦學人員思想不夠堅定」，致使這類學校又停辦了不少。（註一）這是大陸農村第二次教育革命的緣起和失敗。

五十年，毛匪澤東發出「關於社辦、隊辦學校問題，有條件的應該允許辦」的指示，於是大陸農村遂紛紛辦起所謂「民辦小學」，因陋就簡地解決貧下中農子女入學問題。（註二）五十二年，毛酋又推行教育改革，採取「少而精」的原則，減少課程的門類，精簡教材的內容，以加強階級教育與毛澤東著作的學習。翌年，劉匪少奇提出「兩種勞動制度、兩種教育制度」口號，表面上係以全日制使教育素質提高，以半工（農）半讀制度使教育全面普及，實際上則係對毛酋的教育改革政策加以抵制與破壞。因而在這一段時間內，大陸上的全日制學校和半工（農）半讀制學校，往往處於對立狀

共匪農村教育革命的經緯

態，形成所謂「兩條路線」的鬥爭。例如，吉林省農安縣匪僞高家店公社原有兩所中學，一所是五十一年建立的農安縣第十七中學，一所是五十三年由貧下中農創辦的太平嶺農業中學。兩校一道之隔，作風却背道而馳。據說：「一九六二年，縣第十七中學雖然辦到了太平嶺大隊的家門口，可是，大量的貧下中農子女仍然被拒之門外。在全大隊一百九十四戶貧下中農中，只有高中生一名；而在四十一戶地主、富農中，就有大學生兩名，高中生三名。十七中在一小撮走資派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把持下，設下了年齡、學費、考試、留級等道道關卡，百般歧視，刁難貧下中農子女。一九六四年從小學畢業的三十三名學生中，貧下中農子女就有二十八名沒升入中學。就是幸運考入中學的，由於受了中國黑魯曉夫『讀書做官論』的毒害，有些人『進了洋學堂，就忘了土家鄉』。有一個學生在十七中唸了三年書，落了一雙近視眼，染了一身嬌氣，提筆不會寫便條，拿鋤開不好莊稼苗。貧下中農氣憤地說：『在這種洋學堂裏，越學跟咱貧下中農越隔心，越唸離咱貧下中農越遠。這樣下去，用不多久就會人變修，政權變色。』於是這裏的貧下中農採取「沒有校舍生產隊給安排，沒有桌子自己動手搭坯台，沒有凳子學生從家拿」的辦法，於五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在該公社第四生產隊的轅馬站裏辦起了一所「新型的農業中學」——太平嶺農業中學，「他們選出突出政治、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黨支部書記王與同志當校長，組成有民兵營長、老貧農和革命師生參加的校委會，貧下中農成了學校的主人。農業中學成立以後，招收新生和十七中截然不同，凡是貧下中農子女要求入學的，不受年齡限制，不經考試，不收學費，經校委會批准即可入學。其他如選用教員、課程設置、修建校舍、畢業生分配等重大事項都由校委會討論決定而後實行。」但是，農中開辦不久，「公社黨內一小撮走資派憑着竊取的黨政大權，罷了

農中校長的官，把敢於同他們作鬥爭的教師叫做「搗亂份子」，橫加打擊；勒令反對他們的學生退學，懲息他們安插在農中的「負責人」，勾結來歷不清的人建立一座黑鐵匠爐，開起「地下工廠」，生產農村根本不需要的產品搞投機生意，一時把農中搞得烏煙瘴氣。」而十七中的「走資派」則「百般吹噓『正規化』、『質量高』，誣蔑農業中學『不正規、質量低、教不出好學生』。」社會上的「階級敵人」，也「一呼一應，說什麼『農中學生是『中學漏子』不成氣(器)』，『鬼子尾巴長不了』。」(註三)這是大陸農村第三次教育革命的典型。

這三次農村教育革命，乃是毛共整個教育革命的一環。農村教育三次改革三次失敗，而大陸整個教育革命也均無成效可言。因此，五十五年八月，匪黨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指出：「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改革舊的教學方針和方法，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極其重要的任務」，並且強調「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必須徹底改變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註四)共匪「文化大革命」進行了兩年的權力鬥爭以後，其重心又轉移到「教育革命」問題上。五十七年八月，共匪「紅旗」雜誌第二期，發表姚文元「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的文章，指出「自古以來，學校這個地方，就是為剝削階級及其子女所壟斷。解放以後，好了一些，但基本上還是被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所壟斷」，這無異承認共匪歷次「教育革命」均宣告失敗；於是該文又傳達毛酋的「最新指示」：「實現無產階級教育革命，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必須有工人羣衆參加，配合解放軍戰士，同學校的學生、教員、工人中決心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的積極份子，實行革命的三結合，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全部門、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而「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企圖掀起一次大規模的「教育革命」，包括城市教育革命和農村教育革命。這是大陸農村第四次教育革命的開始。

二 農村教育革命的背景

(一) 脫產的因素

共匪實施農村教育革命的主要理由之一，乃是認為舊教育制度培養出來的知識份子，都是「輕視工農，愛擺架子，自以為

了不起的人物」，他們根本不能「為無產階級服務」。例如：

1. 在山東，「學校在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控制、把持下，脫離了無產階級政治，脫離了貧下中農，脫離了三大革命運動。有許多學生在『畢業以後可以當工程師、專家、幹部』的修正主義黑貨的腐蝕下，看不起農村，看不起勞動人民，嚮往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這樣的學校，越學離貧下中農越遠。有的小學畢業看不起爹娘，中學畢業看不起隊幹部，大學畢業咱農村就攔不住了。河套公社孫戈莊大隊從學校培養出的學生，大部份都脫離了農村，現在有的生產隊連個會計也找不到。有的學生雖然回到農村，可是學到的知識沒有用。河套公社山角大隊第五生產隊有個高中畢業生，回鄉當了一年會計，三年沒結清賬。」「過去的農村學校，雖然設在農村，却脫離當地社、隊領導，不根據農村需要辦學，貧下中農對學校的事無權過問。河套公社趙家嶺大隊有一年找學校幫助消滅蟲害，學校老師說什麼：『縣裏沒有規定，停課影響進度怎麼辦？』」(註五)

2. 在甘肅，臨澤縣二中的一些學生，「上了幾天學，就覺得『高人一等』，『說話口氣大，走路步子大，見人架子大』，遇到和貧下中農一起開會，總像貧下中農身上有『刺』似的，坐得遠遠的，生怕沾上點土。」「臨澤二中經費是國家撥的，教師是上級派的，雖然設在農村，却是面向城市，培養出的學生想的是『升學當幹部，掙錢不勞動』。你叫他回隊勞動，他說：『升大學，考師範，農中出來才當莊稼漢。』你說生產隊需要會計，他說：『一把算盤一支筆，當個會計沒出息。』」(註六)

3. 在四川，據說：「一讀中學就要脫產，還要製鋪蓋蚊帳，一年伙食費加零用錢至少也得一兩百元，考上了也讀不起！」「學校不講階級，脫離勞動，有的學生讀了初中中看不起農業，讀了高中看不起工業，讀了大學看不起一切，肩不能挑，手不能提。這種書讀出來有啥用！」「過去貧下中農子女進城讀中學，越讀越不受勞動，越讀越怕艱苦，越讀越講究吃穿。」(註七)

從以上三個實例看來，大陸農村學生就讀後，大都立即脫離生產，同時，農村的學校與公社也沒有適當的配合，以致影響農業生產。這個脫產的因素，也就是經濟因素，它直接影響着農民的家庭，間接影響着農村的公社。因此共匪要再度進行農村教育革命，據說，「現在，初中班的中學生，既是學生，又是社員，沒有那種『洋學生』的臭架子。除農忙假，例假日全部參加

社隊集體勞動外，平時上學前、放學後都參加勞動，能做一班工（兩個多小時）。他們打赤腳、穿草鞋，有的上學還帶上糞筐，在來回途上揀糞，有的還兼任隊上的記分員。」（註八）

（二）階級的因素

共匪認為貧下中農子女上學的少，而留級和退學的多，乃是由於原有的學校制度，設立了「三關」、「四關」、甚至「五關」，把貧下中農子女「關在門外」：

1. 「三關」——據河北省邢台師範學校指出：「過去中國黑魯曉夫搞的什麼入學考試關、升級關、畢業關，這關那關，都是爲了把貧下中農子女關在門外。」（註九）

2. 「四關」——吉林省農安縣高家店公社的縣第十七中學，「在一小撮走

資派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把持下，設下了年齡、學費、考試、留級等道道關卡，百般歧視、刁難貧下中農子女。」（註一〇）

3. 「五關」——匪偽「廣東省革命委員會」關於「貧下中農管理學校」的調查報告指出：「貧下中農管理學校後，砸爛了舊的資產階級教育制度，廢除了分數招生制，打破了封鎖貧下中農子女進校的分數、學費、考試、升學、年齡五道關，徹底改變了過去貧下中農子女受排斥的地位。」（註一一）其實，這些所謂「關卡」的產生，乃是由於貧下中農子女或因經濟因素不能上學，或因勞動關係不能專心讀書。例如：共匪「遼寧日報」調查員引述一個老貧農的話說：「過去總說咱們的孩子笨，比不上地富子女靈俐，這純粹是瞎扯。隊裏一個地主兒子放學回家，他爹對他說：『你埋頭搥書本就行了。咱家成份不好，在這個社會我是沒有出頭之日了，就得指望你唸書得了一官半職好出頭』。這不是叫他的孩子給地主階級傳宗接代嗎？！咱那二小子回家，書包還沒撿下，我就說：『去幹點活去，唸了六個鐘頭的書了，該勞動勞動了。』咱貧農的後代要文武雙全，貧農的孩子不會幹活，我總覺得丟人。」（註一二）

這是地主富農子女升學率比貧下中農子女較高的主要原因，也是兩種階級、兩種教育制度發生彼此懸殊和互相對立之現象的根本原因。這個階級的因素，也就是政治的因素，共匪爲了要使「教育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因而特別要實施農村教育革命。

（三）普及的因素

共匪農村教育革命的經緯

所謂普及的因素，也就是教育本身的因素。共

匪的教育制度，以往一向採取所謂「兩條腿走路」的方針，實行「雙軌制」，一方面加強全日制，使教育素質提高，另一方面推行半工（農）半讀制度，使教育全面普及。毛劉兩派在教育路線的分歧，主要的就發生在這「兩條腿」上，毛派比較着重於「用左腿走路」，主張大量發展半工（農）半讀制度，而劉派比較着重於「用右腿走路」，主張鞏固並加強全日制學校。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因係劉派當權，半工（農）半讀制度致未作適當的推廣，農村教育亦未能全面普及，這不僅使農村青年不能普遍入學，同時亦使大量下放農村落戶的城市青年亦無升學深造的機會。因而共匪要實施農村教育革命，普及農村教育，以消除一般青年及其家長的不滿，並藉以適應農業生產的需要。

三 農村教育革命的現況

（一）貧下中農管理農村學校的兩個實例

五十七年九月十一日和十六日，共匪「人民日報」先後發表了兩個調查報告，一個是由「大眾日報」供稿的「山東省嶗山縣三個公社教育革命情況」，一個是「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調查員的「記遼寧省營口縣水源公社開展教育革命的經驗」，報導貧下中農管理學校後，學校的組織、管理和教學制度的一切改革情況。這是兩個典型的實例，特先敘述如下：

山東省河套、王哥莊、中韓三個公社的貧下中農、匪幹和師生，在縣、社的「革命委員會」領導和匪軍幫助下，決定了管理學校的領導組織和管理方法。其領導組織是：「中學由公社管理，小學下放到大隊管理，建立了由貧下中農、公社或大隊幹部、學校師生中決心把無產階級教育革命進行到底的積極份子組成三結合的領導班子，管理學校。」其管理辦法，王哥莊公社港東大隊的規定是：

1. 每月初召開「生產隊幹部、貧下中農代表、革命師生代表會」，總結前段學校工作和制定下段工作計劃；

2. 月終各生產隊組織有師生、貧下中農參加的座談會，檢查學校貫徹執行毛魯教育路線的情況，檢查學校與生產隊的關係；

3. 生產大隊、生產隊把學校工作列入議事日程，學校關心生產隊的工作

，密切師生與貧下中農的關係；

4. 大隊和學校共同抓好教師、學生、家長的政治思想工作，師生按時參加生產隊召開的「毛澤東思想講用會」，與貧下中農共同「鬥私批修」；

5. 讓貧下中農登上講台，給學生講話；學生有組織有計劃地到生產隊參加生產勞動。

這三個公社共有兩萬多中、小學生，佔總人口的五分之一，依照新的管理辦法，除「經常對學生進行階級教育，組織學生參加社會上的革命大批判和對敵鬥爭」以外，許多大隊的學生都組織起來，監視地富反壞右份子。「爲了增強對勞動人民的感情，培養亦工亦農、亦文亦武的新型勞動者，在狠抓階級教育的同時，各學校都給學生安排一定時間，參加集體生產勞動。有的學校自己還開辦了小型工廠、農場。還有的建立了固定生產勞動基地，實行勤工儉學，自力更生，解決學費、書費和辦公費。」「現在，這三個公社的學生一般每年都能勞動一百天以上，從根本上解決了學校脫離勞動、脫離實際的現象。」教師則「每週都能堅持兩天參加集體生產勞動，每年可以保證勞動七十天。」

這三個試點公社已全部實行了「新學制」，就是「小學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實現「上小學不出村，上中學不過三里」、「各中、小學普遍請工農兵當教師，讓工農兵登上講台」，做到「教師走出校門（去勞動）貧下中農走進校門（上講台）」，以徹底「整頓教師隊伍」。

遼寧省營口縣水源公社的中小學，在「貧下中農掌握教育大權」以後，亦決定建立一套「貧下中農管理學校的制度」，廢除舊的「校長負責制」，各校成立「教育革命委員會」，成員有貧下中農代表和「革命師生」代表。各校的「教育革命委員會」，一律在社隊「革委會」領導之下工作，實行一元化的領導。大隊「革委會」副主任兼「學校教育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學校教育革命委員會」主任也參加大隊「革委會」。

水源公社的「革命師生」又根據毛酋關於「學制要縮短」的「指示」，「將現行的小學六年制改爲五年制，中學六年三三分段制改爲四年二二分段制」；「在不增人員，不添設備，不增加羣衆負擔的條件下，在全社辦了五年一貫制、七年一貫制，九年一貫制的學校共二十所，基本上做到了隊隊有學校，學生唸初中不出大隊，唸高中不出公社。」「學生一律走讀，這樣不

但節省了校舍，貧下中農也負擔得起。一個孩子從六、七歲入學，經過九年到高中畢業，也不過十五、六歲，正好參加農業勞動。」

目前，「新學制的教育已經在水源公社普及，學生的入學率達到了百分之百，過去退學、失學的學生也上學了。全公社共增加了二十六個班，一千一百多名學生。」學校師生採取「走出去，請進來」的方法，一方面參加社隊的「三大革命運動」，宣傳毛酋思想，搞社會調查；一方面請貧下中農來學校講家史、村史，請「大隊治保主任」講階級鬥爭課，民兵連長講軍事課，老農和農業技術員講生產技術課。「許多社員也懂得教育孩子不僅是學校的事，也是家庭的事，要教子防修。」新的師生關係則是採取毛酋的「練兵方法」，「師教生，生教師，生教生，教學相長，共同提高。」

共匪農村教育革命尚在「摸索前進」的階段中，但從這兩個「調查報告」中，我們不難看出其未來的動向和全貌。

（二）農村小學由「公辦」抑「民辦」的問題

大陸農村小學的形式原有三種：一種是「公辦的」，一種是「民辦的」，一種是「公、民合辦的」。例如山東歷城縣英雄山公社，「現有四十四處小學，其中有民辦的，有公辦的，也有公、民合辦的。」（註一三）

共匪實施農村教育革命，其中最重要的一項計劃就是「把所有公辦小學下放到大隊來辦」。五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共匪「人民日報」發表了山東省嘉祥縣馬集公社馬集小學教師侯振民和王慶余的關於這個問題的建議，主張「所有公辦小學下放到大隊來辦，國家不再投資或少投資小學教育經費，教師國家不再發工資，改爲大隊記工分。」其理由是：

1. 「從根本上改變了那種縣文教局領導中心校，中心校領導高完小，高完小領導各小學的修正主義的教育路線，使小學直接在大隊黨支部的領導下進行工作。」

2. 「如果小學由大隊來辦，教師在隊裏是教員，又是社員，是毛澤東思想的宣傳員，又是鬥私、批修的戰鬥員，也能經常參加勞動，聯繫羣衆，既有利於知識份子的改造，對大隊工作也能起到些幫助作用。」

3. 「教育權奪回到貧下中農手中，學校是自己的學校，就能使小學教育工作不脫離政治，不脫離生產勞動，不脫離三大革命運動。教學工作就能與

生產勞動、實際、羣衆緊密切結合起來了，培養出來的接班人，才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4. 「教師都回本大隊工作，一些被清出的地、富、反、壞、右份子就可回本大隊監督勞動改造。地富子女回本大隊教學，也便於受到羣衆的監督。」

5. 「可以減輕國家負擔。現在大部份小學還是國家辦的，小學教師是一支龐大的隊伍，我們馬集公社是一個僅有兩萬一千多人口的小公社，有十四處公辦小學，其中五處高完小，共有教職員五十一人，每年國家要負擔工資二萬多元，修建費三千多元，吃商品糧一萬九千五百八十四斤。如果大隊辦，國家就可減輕二萬三千元和一萬九千五百八十四斤糧食的負擔，用這些錢糧支援工、農業生產，支援國防建設。」

這個建議，在大陸曾引起相當普遍的反應，到十一月三十日爲止，半個月間共匪「人民日報」共收到有關信件和稿件七千餘件。其範圍且擴展到城市中小學應當如何辦的問題上。十二月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北平、上海、天津等城市的讀者所提出的一部份有關建議，主張「城市中小學由工廠街道來辦」，並加編者按語，表示「希望羣衆就如何來辦問題提供意見經驗」。顯然這是毛共的一個計劃，有意作如此安排，企圖透過「羣衆發表意見」的方式去實施。

其實，共匪將教育行政下放地方機構管理乃是一貫的政策，例如民國四十七年共匪即將高等學校大部下放省市黨委領導。當時大陸高等學校共計二百二十七所，其下放地方黨委管轄者即達一百八十七所，其仍由匪僞教育部及中央業務部門管轄者僅四十所，這四十所高等學校乃是所謂「重點學校」。（註一四）民國五十年起共匪推行「民辦小學」，也是一種教育行政權變相下放的措施。當前大陸農村和城市的中小學校下放到生產大隊與工廠街道辦理，乃是全面推廣這項實施已久的政策。

這項學校管轄權下放的政策，就教育而言，乃是對「百年大計」的工作不重視、不負責任的做法；就經濟而言，則顯示出共匪的財力已到了難以支付教育經費的地步了。

（三）教育行政和學制的改革

共匪農村教育革命的經緯

1. 所謂貧下中農管理學校的具體措施，主要的就是「廢除舊的校長負責制和班主任責任制，建立起由貧下中農爲主的『三結合』的管理學校領導班子和教學班的輔導組。把教學班組編成班、排、連，分別設立若干教改小組。」（註一五）至於學校「三結合」組織的名稱，有的叫做「貧下中農辦學委員會」，如「北京海澱區西山中心小學貧下中農辦學委員會」是。（註一六）有的叫做「貧下中農管理學校委員會」，據說河北省廣宗縣的所有生產隊，「都建立了以貧下中農爲主體，吸收革命幹部、民兵和革命師生代表參加的『貧下中農管理學校委員會』，直接進駐學校，領導學校的一切。」（註一七）

2. 學制改革方面，一般都是縮短年限，將小學四年的四二分段制，改爲五年一貫制，中學三年的三三分段制，改爲四年二二分段制。

除小學五年一貫制外，還有初中小學七年一貫制，和中小學九年一貫制。例如遼寧省營口縣水源公社即「辦了五年一貫制、七年一貫制、九年一貫制的學校共二十所。」

值得一提的是：一般慣例都由高級學校附設低級學校或班級，如某某大學附屬中學，某某師範學校附屬小學等是；但是大陸農村小學却普遍附設初中班，甚至還有的附設高中班，例如河北省廣宗縣的一個公社，其十七個生產大隊，「在小學辦了附屬初中班十二個，高中班六個。」（註一八）因此，有些「七年一貫制學校」和「九年一貫制學校」，實際上却是「戴帽子」（加初中或高初中）的「小學」。這種盡量壓低學校名稱的現象，與四十七年盡量提高學校名稱的現象，恰巧相反，當時的「公社」可以辦「紅專綜合大學」、「生產大隊」可以辦「半耕半讀紅專大學」、「生產中隊」可以辦「業餘農業大學」，於是「紅薯大學」和「玉米大學」林立，而實際上這些所謂「大學」，僅是一個「招牌」而已。這兩種現象，都是「教育革命」的產物，足見所謂「教育革命」，不過如此。

（四）教師隊伍的整頓

1. 大陸農村學校的教師，有的要下放參加勞動，有的要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只有少數可以留下來講文化知識課。例如江蘇省東台縣三合公社尖兵大隊的紅光小學的全校教師，「三分之一下放勞動鍛鍊；三分之一聽

貧下中農講課，幫助做知識課輔導和整理鄉土教材；還有三分之一在貧下中農講課團的領導下講文化知識課。」（註一九）

2. 由於原有教師或被下放、或須接受「再教育」，於是大陸各地乃紛紛成立「貧下中農講師團」。「講師團」係由活學毛曾著作的「積極份子」、富有階級鬥爭經驗的老貧農、科學實驗的「闖將」、模範飼養員、復員退伍回鄉的匪軍，以及「造反派骨幹」所組成。「講師團」是不脫離的，其因講課而耽誤的勞動時間由生產隊記工分。（註二〇）

3. 「講師團」設置的課程約有七門，即：毛澤東著作、階級鬥爭、軍事訓練、生產勞動、農業機械、革命文藝、文化知識。（註二一）

（五）招生和學生生活的改革

1. 招生制度，一般是採取「生產隊推薦、大隊審查、公社選拔、教師參加」（初中招生）的辦法。（註二二）

2. 關於學生生活，約有下列諸規定：

（1）學生來校一律不准騎「洋車」（自行車）、吸煙、打撲克和玩棋羅；

（2）學生上下學一律背糞筐揀糞；

（3）不放棄暑假，放春耕、夏鋤、秋收三大農忙假，學生與社員一起參加生產勞動；

（4）學生每人每年至少參加集體勞動九十天，用自己的勞動收入領回個人的口糧；

（5）通過生產勞動改造思想，每個農事季節都要寫一次思想總結。每當農忙時節，那個生產隊有困難，他們就趕到那裏去支援。（註二三）

四 農村教育革命的後果

（一）農村教育水準必然降低

共匪此次推行農村教育革命，「把公辦小學下放到大隊來辦」，由貧下中農管理學校，勢必因陋就簡，各行其是。並把學校完全變成半農半讀的性質，加以學制縮短，而思想政治教育、生產勞動教育、軍事教育和社會鬥

爭活動却不斷加強和增多，中小學生能够坐下來學習基礎知識課程的時間實在有限。同時，若干公社爲了貫徹「學校爲貧下中農子女開門」的方針，還訂定了種種便利貧下中農子女入學的辦法，例如「中途可以入學，允許學生遲到早退，隨到隨教，課程安排忙時少學，閒時多學，大忙放假」（註二四）；「家中弟妹多，無人照管時，可以帶入課堂，邊讀書、邊看管孩子」（註二五）等等，都足以使農村中小學失去常規，教育水準將必然降低。

（二）將步農村教育革命三次失敗之後塵

共匪農村教育革命已失敗三次，此次似亦不能例外，因爲這些由貧下中農管理的學校，大都因陋就簡，「看不見校舍，找不到校長，分不清學生、老師和社員」（註二六），以致遭受到普遍的反對：

1. 許多地方當貧下中農管理學校的時候，「一小撮階級敵人」就跳出來反對，說「農民沒文化，不懂管理學校。教育革命是學校的事，貧下中農管不着。」（註二七）

2. 河南省新蔡縣「舊縣委內一小撮走資派」說：「這所學校（指該縣澗頭公社程莊農業勞動學校）整天拿着毛著唸，圍着地頭打轉轉，簡直瞎胡鬧！」（註二八）

3. 「有一些教師思想不通：有的怕學校下放到隊以後，隊裏辦不好；有的覺得工資變工分，自己『吃了虧』。一小撮階級敵人也趁機興風作浪。」（註二九）

4. 貧下中農講課團走上講台，也遇到了舊習慣勢力的阻撓。一些思想比較保守的人對貧下中農上課瞧不起，看不慣。他們心目中有『三算三不算』：原來的教師上講台才算上課，貧下中農上講台不算上課；學生在教室裏唸書才算上課，參加階級鬥爭、田間勞動不算上課；學生學老書本才算上課，學毛語錄、報刊社論、文章就不算上課。」（註三〇）

5. 「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先生們上竄下跳地說：『學生年齡小不能幹活』，『小孩餵豬是三天新鮮』，『學生在地裏學開拖拉機耽誤生產』。他們還暗地開黑會，放冷箭，惡毒地說：『貧下中農管理學校是鬼子尾巴長不了，將來還得我們教。』並且在學生中煽動：『唸了點書，等於白扔。』在他們蒙蔽下，（黑龍江愛輝縣愛輝公社）外三道溝農中三十八名學生，今年年初

很多人思想波動，有些人三天打魚兩天晒網，六名學生乾脆回家不唸了。」

(註三一)
這些反對的論調，都是農村教育革命的絆腳石，足以阻撓貧下中農管理學校制度的推行。因此，共匪此次農村教育革命，看來也難以逃脫失敗的命運。

註一 五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共匪「光明日報」。註二 五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共匪「人民日報」。註三 五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共匪「人民日報」。註四 五十五年八月九日共匪「人民日報」。註五 五十七年九月十一日共匪「人民日報」。註六 五十七年十一月十日共匪「人民日報」。註七 五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共匪「人民日報」。註八 同註七。註九 五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共匪香港「大公報」。註一〇 同註三。註一一 五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共匪「人民日報」。註一二 五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共匪「

人民日報」。註一三 五十七年十一月十五日共匪「新華社」濟南電。註一四 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共匪「人民日報」。註一五 同註一一。註一六 五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共匪「人民日報」。註一七 五十七年十一月二日共匪「新華社」石家莊電。註一八 五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共匪「新華社」石家莊電。註一九 五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共匪「人民日報」。註二〇 同註一二。註二一 同註一九。註二二 同註七。註二三 同註三。註二四 五十七年九月六日共匪「浙江人民廣播電台」廣播。註二五 五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共匪「新華社」關於「廣州市五七中學」之報導。註二六 五十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共匪「人民日報」。註二七 同註一一。註二八 同註二六。註二九 五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共匪「新華社」瀋陽電。註三〇 同註一九。註三一 五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共匪香港「大公報」。

古巴共黨的獨立路綫及其今後動向

王建勛

壹 古巴的赤化與卡斯楚的專權

古巴位於加勒比海之北，為西印度羣島中最大島國，面積十一萬四千五百平方公里，人口七百萬，大部是白人，其次是歐印混血人及少數黑人。因為古巴人不少是屬於法蘭西血統，在法蘭西與西班牙血統混合後，產生了古巴人頗富個人主義的色彩。

古巴原為西班牙殖民地，一九八八年美、西戰爭以後，西班牙與美國簽訂巴黎條約，將古巴轉讓給美國。一九〇一年五月，美軍結束對古巴的佔領，但依據一九〇〇年美、古所簽訂的卡拉特條款(Platt Amendment)，美國仍保有干預古巴內政的權利，並且古巴租讓必要土地給美國使用，因而美國得在關塔那摩(Guantanamo)建立海軍基地。

古巴共黨的獨立路綫及其今後動向

古巴雖獲獨立，但在經濟上仍屬半殖民地性質，糖業集中於少數美國人公司，國家經濟限於有限原料生產，經常有五十萬人失業，而政府又貪污腐化，壓制人民自由，因而在一九〇六年七月，古巴爆發革命，古巴第一任總統埃斯塔達(Tomas Estrada Palma)被迫辭職，經美軍干涉始成立臨時政府。此後古巴幾度發生政治糾紛，亦均由美國出面干涉與調停，直到一九三四年美國羅斯福總統實行睦鄰政策，卡拉特條款始自動取消，但美國迄今仍佔有關塔那摩基地。

一九三四年，古巴經濟由於國際糖價大跌而發生危機，且社會不安與罷工風潮，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乃乘機以參謀總長名義實施軍事獨裁，歷時達十一年之久。一九四〇年，巴蒂斯塔當選總統，一九四四年繼續競選未獲連任，一九五二年乃發動軍事政變又取得政權，一九五四年，巴